

記「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銀禧之際，經多時的籌備於1992年12月21–23日舉辦了「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共收到40篇論文，與會學者有數十位，包括來自大陸14人、台灣6人、美國和澳洲共12人及香港24人。海峽兩岸及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共聚一堂討論「民族主義」這一課題，還是第一次。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在開幕致辭中說，民族主義是一隻靈獸，也是一隻怪獸，因此往往導致其為極其矛盾的客觀目標服務，這是值得研究者密切關注和認真思考的文化、政治理念。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在歡迎辭中也強調，民族主義之值得人們重視，不僅是因為它在近現代中國具有強大感召力，而且近年來還成為國際上最受矚目的政治動力，因此對民族主義的反思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設不可忽略的部分。他還宣佈，中國文化研究所即將成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繼續為中國文化的三岸交流與創新發揮觸媒作用。

研討會分十個部分：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近代民族主義含義及危機、晚清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理念及比較觀、近代人物的民族主義觀、民族主義理念及形態、區域意識與民族主義、近現代思潮與民族主義、文化心態及其他、文化與民族認同，是對民族主義多學科的檢討。政治學學者姜新立指出，民族主義的理論概念與類型模式均有多種形式，在解釋上容易產生意義不同的概念理解和理論結構。而劉平鄰則用政治學概念提出中國有很強的「政府主義」，而沒有「民族主義」

或「國家」觀念的傳統。人類學學者謝劍和謝世忠均使用「國族主義」代替容易引起歧見的「民族主義」。謝世忠是通過南詔、泰族與雲南故國來闡明自己的觀點，而謝劍則強調中國國族主義是包含多種族群的由歷史演化而形成的統一系統。石元康區別了「自主」與「自決」的概念，他認為「民族自決」並不能從「人權」中推出，必須重新探討它的基礎，並嘗試將其歸為一個民族保持自己文化認同的權利。

儘管在討論中學者們對民族主義的理念及形態尚不能得出較為一致的見解，但這並不影響與會者就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扮演的角色進行深入的檢討。張玉法考察了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角色，認為民族主義的強度隨外患的強度而增長，有狂熱的一面，導致近代中國人對外國人常抱有懷疑、敵視的態度，頗影響國際合作；但另一方面在緊要關頭也發揮了動員中國人民共同挽救國家危亡的作用。汪榮祖論述了中國民族主義不斷面臨來自帝國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主義的挑戰而陷入危機。金觀濤和劉青峰的兩篇論文相互銜接，探討從傳統華夏中心主義向「新華夏中心主義」的嬗變，認為中國民族主義尚是不能由理性駕馭的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他們提出，傳統華夏中心主義存在着道德價值一元論組成的世界主義和中國制度文化最優的兩極，在經歷了衰落和一段多元化時期後又為新華夏中心主義取代——仍以某種普遍主義的對制度文化的忠誠代替對民族國家的忠誠；文化革命的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現象是明顯的一例。袁偉時

則對白魯恂〈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一文（見本刊總第9期）提出尖銳的質疑。

許多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國民族主義所表現的形形色色。韋政通闡述了曾以民族主義為主要動力的台灣意識而今表現為「住民意識」、「鄉土意識」、「省籍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住民自決意識」、「台獨意識」六種內涵。朱維錚從清末思想文獻中清理了本世紀初民族主義的傳播和爭辯的歷史實相。葉曉青探討了十九世紀開埠後相當缺乏政治及民族意識的上海，何以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一、二十年中被喚起。朱泓源以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變與不變的成分為分析的重點，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經歷了早年的種族觀念——革命時期的排滿主義——民國初年的民族融合說——聯俄容共時期的反帝主張等不斷的變化。許紀霖以梁漱溟思想發展三個階段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揭示文化民族主義者會不由自主地走向反現代化之路。章清討論了中國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緊張關係。李金強則考察了國共兩黨之外第三黨——青年黨的代表人物曾琦的民族主義心態。有的學者還從文藝作品的視角來考察民族主義，郭穎頤考察了李伯元小說所反映出的改良和啟蒙及其批判功能，指出清末小說為民族主義的興起發揮了作用；馬軍驥則認為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早期中國電影的面貌。

民族主義和文化的關係，以及不同民族的民族主義比較觀是這次研討會的另一個熱點，爭論的焦點則常常落到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上。陳方正以各別主義與普世主義的雙層結構給民族主義定位。在他看來，民族主義對民族內部而言是把各別性原則和存在普世化，而在國際上則有將普世性原則各別化的傾向。談到中國問題他認為作為一個最早完成多個階段民族與文化融合的大國，今天最有條件去發展的應是類乎美國甚至瑞士那樣以一個普世性的政治架構為基礎的多民族、多文化、

多元國家，不應提倡民族主義。李澤厚在評論中贊同這個觀點，強調物質世界的一元化是避免不了的，而文化多元化則應發揚。林毓生在發言中也指出，現代中國同時面臨着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的三重危機，因此所產生的民族主義便不免具有極大的依附性。劉述先提出，世界愈益變成一個地球村，因此重要的是賦予理性以彈性，保持民族特色與文化的多元化。郭少棠主要從德國現代化的經驗出發，提出民族國家的成長與發展與民族主義關係十分密切，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民族主義在不同的社會顯現出不同特色。胡春惠比較了近代中韓兩國傳統民族主義結構上的類似性。韓國自稱為「小華」，它和現代化的關係幾乎與中國歷史上的經歷相同。有的學者着力探討甚麼是健康的民族主義。孫國棟認為民族文化才是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現代中國數次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運動共通的弱點均是脫離了民族文化。蔣慶更是以為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是無根的，對治之道是確立以儒家傳統作為民族主義的根本。

研討會在熱烈爭辯的氣氛中進行，與會者暢所欲言，爭相交鋒。除了上述學者外，湯一介、劉志琴、虞和平、賀躍夫、康丹、楊念群、勞思光、翁松燃、陳其南、廖光生、喬健、杜祖貽、周英雄、梁元生、齊錫生、劉義章等學者也參加了討論會。在綜合討論發言中，許多學者表示非常珍惜這樣一次從學術角度討論愈益敏感的民族主義問題的機會。由於民族主義不僅在前兩個世紀也將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與會學者希望今後有機會繼續深入討論有關問題；同時，認為像這樣由不同地區、不同學科的學者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共同感興趣的學術文化問題，也是一種好的形式；並寄望即將成立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能夠成為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整體承擔的又一新的學術文化機構。

（慶源）